

## 编者按

慎终追远在清明。2020年的这个清明节注定让我们多一层缅怀、追抚与思考。

远的不提,当我们回忆起17年前,会发现此时与彼刻有太多的相似。面对苦难,人类仿佛总在经历,也总是遗忘。难道真如黑格尔说的“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是宿命?

忘记苦难也许是人类趋乐避苦的一种本能,但记住苦难、反思苦难却是人性光辉的底色。唯有如此,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才有不断向前的底气,也不枉面对那些逝去的生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怪圈。

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体记忆,并永久地固化下来、流传下去,我们该做些什么?具体到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它,才能达到记录历史、悼念逝者、教育后人的目的?

《中国科学报》邀请了数位医学史、科学史专家和作家,谈谈我们对苦难的遗忘与记忆。

## 访谈嘉宾

刘士永  
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田松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余世存  
作家

## 我们为什么容易忘记苦难

《中国科学报》:黑格尔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对苦难历史的记忆呈现一种怎样的态度?

刘士永:人是依赖记忆的生物,但非常可惜,历史记忆常因时光远去而褪色甚至扭曲。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不管是SARS或流感,甚至是更早以前的鼠疫,都在不同国家被提出早作为防疫警示或参考基准。但事实上,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在运用历史例证时,多半都只是剪裁符合需求的历史片段,而对整体的历史场景与脉络毫不关心。如此做法造成的历史误解,怕比不学习历史教训更严重。

大疫当前,专家的声音往往被最简单、最日常的思考与用语所掩盖。大疫过后,又因为人性急着要遗忘恐怖气氛,不愿回想、不愿检讨,以为把一

切抛在脑后就能迎来光明,当然就更容易让历史的经验和以重大牺牲换来的教训归于泡影。

20世纪80年代的脑科学研究发现,遗忘是人类大脑发展的重要功能,让人能以乐观的态度向前行,但这对于历史教训的汲取却未必是好事。

实际上,历史仍在人性的底层发挥作用,只是我们毫不自觉或刻意不反省而已。如果不想让历史为鉴只成为一种口号,那就得回归历史专业,并且直刺人性卑劣懦弱的底层。

李侠:一方面,人的记忆是会衰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分母越来越大,一个灾难事件所占的分量也会越来越小。最后,随着经历者的逝去,留下的记忆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个体记忆虽会消失,可一旦无数个个体记忆被固化下来,上升成为民族的、社会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就可以被传递,就像基因一样。但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的事件最终能够

## 反思苦难,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真正变成集体记忆,成为一种精神财富,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撑作用。

比如当年的非典,2003年至今17年过去,整个SARS事件留给我们的更像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它丰富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新陈代谢,已经被稀释了。它带来的伤痛,对于整个社会集体而言,也许不那么大。相较而言,几次大地震因为伤亡比较严重,在人们心目中的痕迹会更深一些。在灾难性事件中,对记忆影响巨大的是人类牺牲的规模。

余世存:中国人确实特别善于遗忘,对于西方人来说,则是现代文明的成就让他们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虽然号称是一个历史记载、历史写作传统很悠久的民族,但我们的历史记载是缺乏理性的,这与中国文化缺失理性、逻辑有关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社会学的训练。

就拿普通人来说,我曾经给学生

出考题,让他们写个人的成长史、家庭史,但很多人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出生日期都不愿意去调查,只说不知道就把作业交给我。我们在精神意识当中缺乏这种观念,很多人写回忆录写得过于感性。

一个家庭是如此,一个社会更是如此。比如,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留下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这些重大事件的音乐、电影、好的小说都没有,顶多有点零星的个人回忆。从个人到社会,我们都缺乏社会学的、理性的梳理和总结。

《中国科学报》: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到全球,欧美国家成为疫情第二波的中心。此次西方在吸取当下和历史的教训方面表现如何?

刘士永:除了人类对苦难共通的态度之外,此次欧美国家忽视中国疫情发展,也是其历史与社会成见的产物。19世纪以来欧美的“黄祸论”观点从未消失。从1894年香港鼠疫,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鼠疫甚至是更近的1968年香港流感、韩国MERS、2003年非典,欧美一贯的思考就是肮脏的亚洲才是病源。这样的心态一直都未消散,而且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更加发酵,最终导致了以封城为代价换来的宝贵时间,遭到忽视且白白浪费了。

类似的问题不是没有发生在亚洲或是国内。非典期间,韩国以个案数少宣称泡菜内的酵素有抗SARS功能,俄罗斯则口耳相传伏特加酒有体内灭菌效果。其它地区则归咎于广东人什么都吃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中国公厕的污秽严重等等。这些指控除了强化民族主义情绪与归咎他人外,实在看不出对了解病情与日后防疫有什么实质帮助。人心的轻忽与浮动、各种成见带来的侥幸心理,造成了现在欧美的困境。

余世存:西方有点忘乎所以了,明明知道可以人传人,但错过了这么多时间和机会。这与他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对技术文明的迷信有关。他们总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技术能把人类带到一个黄金世界中,却不知道文明再怎么发展,总会伴随着负面的东西。全球化本身也是,西方文化认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火车头,以为自己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以及其他文明,如印度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认为后者都是有求于西方的,这个观念很成问题。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在面对苦难方面有什么思想?

余世存:其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适合应对灾难的,因为中国人有对称性思维,或者叫阴阳思维。比如,有善必有恶,有好必有坏。

应对灾难,中国人也有一些重要的办法,比如问责。道光、咸丰年间,京城附近出现了旱灾,皇帝连下三次诏书问百官最近几年的政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当,大家畅所欲言。

《中国科学报》:一提到对苦难的

反思,我们很容易想到邻居日本。日本与中国、西方面对苦难的态度,又有何相同与不同?

王一方:日本国民面对灾害的镇静与淡定,是在灾害频繁降临中习得的。关东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引发福岛核事故的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几乎是隔几十年就周期性地发生,更不用说5级以下的中小地震,每年、每月都有可能降临。危机中,他们练就了穿越苦难,继而驾驭、超越苦难的心态和技能。

余世存:日本是脱亚入欧,学西方学得很多,所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这次疫情,日本虽然开始时也有点问题,但总体来讲,能够激发国民自身的理性和智慧。

田松:一种文化特质其实是可以被建构的。很多时候,它与舆论场有关。社会机制本身具有一种筛选能力,这种筛选能力极其厉害。当记录那些苦难的、悲伤的甚至阴暗的情绪和信息是不被鼓励的,甚至可能带来风险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就必然会减弱。渐渐的,人们就会适应一种被筛选之后留下的文化。

于是,我们对苦难的记忆力就越来差,我们对苦难的共情能力也在下降,感受不到唇亡齿寒、兔死狐悲。

##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苦难

《中国科学报》:如果说趋乐避苦是人类的一种本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违背人性”记住苦难呢?

李侠:趋乐避苦可以说是个体的一种本能,但是从社会、民族的层面来讲,这种趋乐避苦的倾向是有害的,有可能加深灾难。它会让人失去理性,失去敏锐性和警惕性。苦难本来是人类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而群体的遗忘,会让这种代价彻底沦为沉没成本。

当我们建构集体记忆的时候,也许会无数次触碰到那些比如失去至亲的人的伤痛。对他们而言,那是撕心裂肺的东西。

这对他们来说是伤害吗?刚开始是,但从长远来看,只有理解和正视它才能真正走出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体记忆其实是一种群体性疏导。

悲伤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忘记?人天然地想要回避悲伤,在回避的过程中很可能让我们拒绝去作更多思考。如果只把悲伤当成禁忌,那么它只会在心里成为一种包裹。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集体记忆,不是为了让人们沉湎于苦难之中,变成一种心理负担,而是通过反思和学习,改变我们的观念,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准。这是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是不甘让受伤的人们白白付出巨大的代价。

余世存:要记住苦难是因为,我们太容易陷入一种进步、发展的很轻浮的狂喜当中,包括现代性,我们以为现代性就是一马平川地走向辉煌、走向

不断的享受,但实际上,人类永远摆脱不了这种负面的东西。用中国《易经》的话来讲,就是有泰也有否,无论是否极泰来还是泰极否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王一方:疫情拐点初现之后,情绪趋于安定,处理更加明朗、得当,事后的理性反思开始展开,它有助于人类累积学术与思想洞识,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转变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一个灵魂提升的精神事件。相反,对历史的失忆是精神荒芜的标志。

## 我们如何记住苦难

《中国科学报》:如果说对历史的记忆是需要通过学习完成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做到记住苦难?

李侠:集体记忆并不会自然生成,它需要建构的。进入一种学习模式,对苦难进行重温、探究和反思,这是形成并且维护集体记忆的基本前提。只不过,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学习的窗口开得很小。

我们今天说,形成集体记忆在全球化时代特别重要,新冠肺炎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集体记忆,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过去我们以为,距离是一种保护,但在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时代,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场灾难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把时代的偏见、个人的偏见剔除掉,这需要大量搜集、整理的工作。然后,才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它、解释它、反思它,这一步也是修正和完善集体记忆的一种方式。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建构集体记忆的责任。

王一方:灾难是人性的考场,苦难是人生的导师,我们就在现场赶考,不应该放弃对生死、苦难本质的叩问,对灵魂高下、清浊的拷打,不能只是简单地直面苦难,还应该“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从而穿越苦难、超越苦难,在苦难中获得精神的升华、涅槃。

田松:无论是否被鼓励,我们对疫情的反思一定是会有。但在反思之前,我们必须完成的一件事,就是真实、客观、完整地记录这一事件。我们需要先把事实判断搞清楚,知道它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又是如何结束的,然后才可能分析因果。只有掌握了完整的事实,我们的反思才能够更切合实际。走偏的事实,只会得到走偏的反思。

不过,即便我们记住了,也反思了,还是不可能期望所有人都不会再次犯错。孔子说,君子最高的操守是“不迁怒,不贰过”,可事实上,一个人要想“不贰过”是很难的,因为人是有惯性思维的。在我看来,能在反思中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就很好。要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认错,自己的锅还得自己背着。过去,在中国的历史传统里,是有认错文化的,是鼓励人们敢做敢当的。

## 如何纪念,才能给历史一个交代?

从一个灾难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体记忆,永久地固化下来,必须要有触媒,同时它也是纪念的载体。

正因如此,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发出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的呼吁之后,迅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认同。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并将成为历史。我们将用怎样的方式纪念它,才能达到记录历史、悼念逝者、教育后人的目的,这个问题值得被回应。

## 来自微观叙事的“疫情日记”

3月27日,一本《武汉封城日记》出版了。

作者是一个2019年底才从广州搬去武汉生活的普通社工,她叫郭晶。她从1月23日开始在微博写封城日记,坚持了60天,吸引了195万的阅读量。

日记的内容无非是对武汉普通市民生活点滴的观察,她访谈环卫工人,关注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该怎么办,参与小区团购,探讨疫情期间的家暴问题、抑郁问题……她说,写日记的初衷,是因为作为一个社工,比别人更清楚,“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首先要有人讲出来”。

许许多多更平凡的人,想要在不同角色的中国人在这次疫情中是如何度过的。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种纪念。

“疫情日记”,这种来自民间的微观叙事已经成为了此次疫情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些日记中有很

多主流叙事触及不到的,甚至是遗忘的角落,它恰恰是有助于理解疫情社会尤为珍贵的素材。

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田松看来,网络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成为一个记录者,无论是用文字、图片还是视频的方式。

一个人一个视角,个体记录总是零散的,可它们又是如此真实而丰富。倘若我们把这些集合起来,用心整理、合理裁剪,这些内容就会拼凑成疫情之下一幅巨大的社会文化群像。

由此,田松想到,可以号召大家像捐赠书信一样,把自己与疫情相关的一部分朋友圈、微博“捐献”出来,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虚拟或者真实空间中进行展示和分享。那时个体记忆就变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纪念方式产生的情感共鸣可能比鸿篇大论更打动人心。

## 沉淀理性的博物馆

然而,灾难中的个体记录常常带着一种浓烈的主观情绪,它很有感染力,却不容易持久,得以沉淀的一定是理性的东西。剥离情绪和痛苦,客观记录并反思,恰恰是博物馆应该做也最擅长做的,如此才会对后世有启迪的意义。

17世纪,英国黑死病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导致伦敦1/4的人口死亡。而在瘟疫事件平息后的300多年后,当年最终成功截断疫病的亚姆村用一座博物馆把那段历史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人们缅怀过去、追忆曾经为之付出的纪念,它就是英国曼彻斯

特的亚姆村瘟疫博物馆。

瘟疫博物馆是一种特殊的主题博物馆,它与医学密切相关。陈履生呼吁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也是因为至今中国都没有一座国家级的医学博物馆,来进行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专门收藏和展示。

博物馆承载的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有物质现实,也有精神内涵。当然,它首先应该是以实物为语言的,因此,那些灾难发生时刻的见证物,将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体。

比如,陈履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博物馆里的展品,可以包括医护人员日记和病患记录,还有一些文件、用品,比如口罩;博物馆还应该集纳一些普通人的资料,以及日本捐给中国写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物资包装盒这类有社会影响力的物品;博物馆也可以展示科学防疫中的一些新仪器和设备、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案,以及不同阶段的认识,等等。

他还提醒说,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系统收集和整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各样能反映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物品、资料等,包括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特殊病例的诊断资料等。

“我们看过太多灾难的纪念物,从博物馆到纪念碑,但和历史研究一样,纪念物建立的当下都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思维脉络。”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刘士永说,举例来看,广岛原爆纪念馆是为纪念日本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原子弹受害难者,长崎原爆平和公园旨在反战和平主义,几年前建立的福岛核灾纪念馆

想警醒人们面对天灾的无助,“然而,这些纪念馆都放大了建造者想要的叙事,也忽视或移转了某些历史事实与不被人知的黑暗面”。

田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集体记忆在被建构的过程中,哪些是该被纳入的,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其实是可以被筛选和干预的”。

即便如此,建立全国性的纪念物是有价值的。刘士永比较期待能看到有关武汉人民与医护人员抗疫情的纪念馆,“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们才是疫情下人性的亮点,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被迫或主动,都值得我们记住他们正面对人性本能的恐惧与懦弱。”

## 显现精神姿态的文化作品

相较于实体的建筑纪念物,刘士永更关心大疫经验可否以文化形式被流传纪念,因为文化是更有弹性,更能随着新理解、新社会脉络因时达变的客体。文学、电影、通俗历史……都可以是形式之一。

比如,加缪的《鼠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此次疫情期间被无数人重温,再一次显现了文学直击人心的力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安认为,前者可以作为一种公共事件教科书的文学作品,后者,如果我们刻意回避爱情的部分,其实也有教科书式的内容。对于这些作品,人们接受起来会更加容易一些。

影视是另一种容易被记住的形式,陈安提到了美国电影《传染病》极



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的《永恒的记忆》

度恐慌,是展现我们对埃博拉病毒这类烈性传染病的应对,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还有日本的《感染列岛》、韩国的《流感》、意大利等国的《卡桑德拉大桥》,以及中国不多的关于传染病的电影《大明劫》。“经历了这次疫情再回看这些艺术作品,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除此之外,口述历史无疑是收集灾难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大量的档案素材可供社会学者、人类学者进行文本分析和解读,完成这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沿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曾经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还有《倒塌之后:纽约客记忆中的“9·11”和之后的岁月》,这些作品将对受访者的访谈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出来。

据悉,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发起灾难口述史项目,向全社会征集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口述历史档案。

“比较可惜的是,总体而言,国内围绕传染病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屈指可数。”陈安坦言。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还缺少直面灾难历史的精神姿态?

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刘士永回答说,“如果从我工作与学习专业的立



本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